



儒学嬗变与魏晋 文风建构

Researching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fucian Evolution and t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during Weijin Dynasty

孙宝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儒学嬗变与魏晋 文风建构

Researching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fucian Evolution and t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during Weijin Dynasty

孙宝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嬗变与魏晋文风建构/孙宝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479-6

I. ①儒… II. ①孙… III. ①儒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②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B222.05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5118 号

责任编辑 李 俊

美术编辑 吴 慧

责任印制 张之秀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1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75 插页 2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479-6

定 价 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
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林家骊

有关中国文学与儒学关系的探讨,是近些年学界较为关注的话题。不过,就目前的相关成果来看,还没有专门针对魏晋儒学和文学进行宏观论证的著作问世。本书对魏晋文学与儒学进行多层面的复合式研究,有助于恢复对魏晋历史原貌的理解,可开拓当前学界相关研究的视野和空间。

本书揭示了魏晋文学改变两汉以来一直作为儒学附庸的屈从地位,进而走向与儒学并峙、互融的历史进程。其首先弄清了魏晋文学与儒学发生关联的条件及表现,然后分上、中、下三编各有侧重的进行阐述。上编集中探讨魏晋王室的兴儒举措及对士风的督导作用,中编集中探讨魏晋文士的儒学思想及创作中的儒学意蕴,下编则主要从儒家文艺批评思想中汲取若干命题,考察其在魏晋时代演化及对文坛的影响。全文骨架坚实,叙述眉目清晰,尤其中编对于个体作家的儒家思想及文风特色的解析实为全书写作的基础,其详尽分析了21位魏晋作家的儒学思想构成和文风样貌,在此基础上对魏晋儒学环境、兴儒举措、私学发展、儒家文艺批评理论等对士格、士风、文风的建构作用,进行了宏观又客观的叙述,因此其立论是比较扎实的。没有对魏晋个体作家的分析解读,就谈不上对魏晋文学规律总体上的把握,本书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把上编的儒运兴替、士风迁转与下编的儒学文艺观的渗透有力的绾结起来。

魏晋儒学与文学间的相互推动和制约,是书中始终围绕的重心。在对汉末、三国、两晋儒学嬗变的历时叙述中,书中没有简单的征引正史儒林传、艺文志、经籍志、文苑传等资料,进行平面化罗列陈述,而是从众多的经史材料中加以悉心甄别,将魏晋不同历史阶段的儒学变迁和士人的价值选择、文

艺趣尚及文风特质有机结合,归纳出了许多令人深受启发的结论。如书中在“汉末儒风转换与建安文坛”、“魏、吴、蜀易代之际的儒风与文风”、“东晋儒学文化型态与士风”、“儒学融通与东晋文运的演进”等章节的写作中,就不乏精到的见解。本书下编从儒家“情性论”、“山水自然观”、“诗言志”观、《周易》情辞观、意象论、王道正统意识、“比德”观等范畴,考察上述儒家文艺思想对于魏晋诗、赋及应用文体创作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大量的作品解读,论证上述影响的积极性和阻抑性,分析细致入微,又不失纵贯魏晋全局的把握,体现出作者运用这一阶段经、史、子、集等各类材料的较为纯熟的能力。

本书的创新之处较为明显,其以魏晋儒学史与文学史交叉研究的复合视野,通过翔实材料与众多的个案分析予以印证,归纳出魏晋文学发展的若干规律。历来关注较少的魏晋颂、诔、箴、铭等几十种应用文体的儒学内涵和艺术特色在书中得到集中探析;其立足魏晋儒学政治化、学术化、个体化、生活化、艺术化等多重特质,多视角、多维度地搭建起儒学与文学相互影响的宏阔景观。这既有利于对魏晋作家的思想面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做出全面评价,也有助于加深对这一时期各种思潮的多层面及文学发展的复杂性的认识,可拓展魏晋乃至六朝思想与文学交叉研究的新领域。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孙宝自2003年9月开始做我的硕士研究生,2005年5月通过本校文学所相关专家的考核将其转为我的直接攻博生。又经过三年的磨砺锤炼,其于2008年6月顺利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此书的前身就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其初稿字数六十余万字,经过这几年的不断打磨,此书较之原初的样貌已有了较大的删润调整,其文笔也日趋干练谨严。《文心雕龙·风骨篇》说:“夫翬翟备色,而翻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鹰隼的羽毛虽然没有野雉的富美鲜丽,但是却骨力强劲、气势刚猛,自然飞得更高。可知,繁芜总不如质朴有力。也正因如此,我对其书现在的进步是表示赞赏的。

孙宝从我问学期间,衣着简朴,待人谦和,为人正派。其讷于言,敏于行,师友间颇多好评。他于2008年6月通过答辩后,研究所拟定他留校任教,但是按照浙江大学留人的规矩要先做二年博士后。我曾就其日后规划与之长谈。近些年就业前景日趋严峻,各行各业的准入门槛相应抬高,即使高学历群体也概莫能外。我希望他当时就着手准备入站深造,以寻求将来留校工作的机会。他坦言出自农门,为家中独子,且父母年事已高,时不我

待,需要他尽快自食其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深造之事,则可俟之来日。这种责任心和担当意识,不可多得,值得嘉许。2008年9月,孙宝入蜀任教。当时四川正处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阶段,大大小小的余震不断,着实为其担心了一番。不过,其所在西华师范大学前身为四川师范学院,曾涌现出伍非百、汤炳正、郑临川等众多学术名家,教学和科研的平台均较好;同时,他始终爱岗敬业,踏踏实实,不断提高业务水平。2011年至2013年间,他又进入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师从杜泽逊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其博士后报告延伸了博士论文的论题,名为“南北朝儒文互动关系研究”,其相关论述也在出站答辩中得到与会专家的认可。对于他的每一点进步,我都倍感欣慰。

现在孙宝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嘱我为之作序。作为他的授业之师,自然是非常乐意的。我希望他能够以此书作为新的起点,顺势不骄,逆境不馁,勤耕不辍,自强不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取得更多更大的业绩。

是为序。

2014年3月于浙江大学寓所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意义、研究范围、思路与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其表现	11
上编 魏晋儒运兴替与士风建构	23
第一章 汉末儒风转换与建安文坛	24
第二章 三国儒学建设及对文学发展的促动	34
第一节 曹魏儒学建设与皇室文学的儒学特质	34
第二节 孙吴儒学建设与对文事活动的推动	45
第三节 蜀汉儒学建设与对文事活动的推动	50
第三章 西晋儒学建设与崇儒文风	58
第一节 魏、吴、蜀易代之际的儒风与文风	59
第二节 西晋的儒学发展与士人心态	69
第四章 东晋儒学混融与文风演进	90
第一节 东晋儒学文化型态与士风	91
第二节 儒学融通与东晋文运的演进	99
中编 魏晋文士儒学思想特质及文格建构	110
第一章 三国文士儒学文艺思想与创作	111
第一节 《中论》与徐幹儒化文风	111
第二节 王肃儒学文艺观与曹魏文坛	119
第三节 何晏儒学文艺思想与创作	128
第四节 儒玄嬗进与阮籍沉郁睿哲赋风的形成	138
第五节 经韵儒趣与嵇康“清峻”文风的形成	146
第六节 薛综儒学文艺思想与家族文学创作	174

第七节 秦宓、郗正儒学文艺思想与创作	183
第二章 西晋文士儒学文艺思想与文学创作	187
第一节 杜预的儒家文艺观及其文学实践与影响	188
第二节 陆机的儒风旨趣及其繁缛风格的形成	196
第三节 傅玄儒学文艺观的内涵及其表现	206
第四节 傅咸家风与魏晋文风流变	217
第五节 “左思风力”的儒学意蕴及其审美构成	227
第六节 潘尼、“三张”、挚虞的儒学思想意趣与创作	235
第三章 东晋文士儒学文艺观及其创作	246
第一节 葛洪儒学文艺思想与创作	246
第二节 范宁及家族后进成员的儒学文艺思想与创作	254
第三节 陶渊明的“六经”观及其文风建构	261
下编 儒家文艺批评思想在魏晋文坛的应用和发展	283
第一章 儒家情性说对魏晋情、物交感论的影响	
——以陆机《文赋》为中心视角	285
第二章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294
第三章 《周易》与魏晋诗风演进	303
第四章 儒家自然观与魏晋田园、山水诗	313
第一节 魏晋田园意识与田园诗创作	314
第二节 儒家山水自然观与魏晋山水诗的演进	321
第五章 魏晋赋颂创作及其儒学意蕴	333
第一节 儒运迁转与汉晋骚体赋体式演进	334
第二节 魏晋颂的诗化与诗教顺美意识的固化	345
第三节 儒家政教文艺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355
第六章 魏晋应用文体创作与其儒学内涵	369
第一节 魏晋政治性应用文体的儒学意蕴	370
第二节 魏晋军事性应用文体的儒学文体渊源与创作	378
第三节 魏晋学术性应用文体的儒学意蕴	387
第四节 魏晋日常生活性应用文体的儒学意蕴	405
结语	436
主要参考文献	448
后记	464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研究范围、思路与研究综述

一、选题意义

儒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步以儒家经典的经义教旨为核心而形成具有学术流派、政治思想型态、社会文化心理、艺术审美取向等多重属性,自先秦原始儒学阶段,儒者言辞所具有的文学元素就愈益明显。《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商周之世,则仲虺垂诰,伊尹敷训。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足师矣。”又说:“苟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①上述说明先秦圣哲或儒士不乏精于文事表达者,其言辞论断也颇有文学化特征。尽管西汉初期至成、哀之际,文坛“辞人九变”过程中辞赋创作多以屈原楚辞为宗,但也涌现出贾谊、董仲舒、扬雄、刘向、刘歆等一批学为通儒、才兼文杰的人物,甚至扬雄、刘向父子还引领了出经入史的创作风气。《文心雕龙·才略篇》说:“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事类篇》亦载:“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摭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②可知,自西汉末期以来文学与儒学的结合不仅日趋紧密,还开启了后世文人以征圣宗经为指向的创作模式,东汉一代则首当其冲。《文心雕龙·时序》说:“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

①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第1766、1770页。按,以下引自此书,则仅列书名及页码,不再详列其版权信息。余例均同。

② 《文心雕龙义证》,第1796、1415—1417页。

聚,故渐靡儒风者也。”^①正是其鲜明写照。这种为文宗经或立论崇儒的趋向在魏晋时期也较为普遍。如锺嵘《诗品》将曹植的创作渊源归为《国风》,将阮籍《咏怀诗》导源于《小雅》;《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才略篇》说:“傅玄篇章,义多规镜。长虞笔奏,世执刚中。”又说:“孙盛、干宝,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②不仅南朝文论家注意到这种情况,后世文学批评中亦有所关注。如朱熹曾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③刘熙载也说:“陶渊明大要出于《论语》。”^④等等。虽然魏晋时期文学儒化的情形已不能两汉阶段相比,但毕竟作为当时文坛的客观存在不容我们忽视,也不可轻视。

目前学界从思想层面探讨魏晋文学发展规律及其相关表现,研究重心主要落在魏晋文学与玄学的交互关系上。作为一种主流的研究视角,其历史必然性和逻辑上的确当性已不必多说。作为先秦原始儒学、两汉经学的历时性衍生品,魏晋儒学既有突显的经学成就(如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范宁《穀梁传集解》),亦有著名的儒家类子书,还有儒典玄变后的全新理论著作(如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可以说,若以奇正通变的观念看待魏晋儒学,则其与魏晋玄学有着一定的思想交集,学界既有的魏晋玄、文互动关系研究自然为本书的相关探讨提供了强有力的立论参照和理论支撑。除此之外,学界也有许多涉及魏晋文学与儒学关系的细部研究,如对魏晋某一作家、某一流派、某一文体样式、某一文论著作的儒学思想内涵、文艺倾向加以分析,并形成体系严密的学术专题,这对本选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随着学界相关认识的日趋深化和既有成果的日渐丰硕,全面清理魏晋文学中的儒学意蕴已势在必行。以此为选题大致有以下意义:

第一,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文学与儒学的关系探讨目前已趋于完善,但仍略有余憾。1994年8月20日至24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内容涉及“仁学”对文学的影响、儒学自身层次与后世接受对文学的影响、明代理学与文学关系、儒学对小说、戏曲的影响、儒学美学观及与文学批评关系等

① 《文心雕龙义证》,第1684—1685页。

② 《文心雕龙义证》,第199、1817、1827页。

③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3324页。

④ 【清】刘熙载撰、萧华荣、徐中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巴蜀书社,1990年6月,第55页。

方面,可谓广泛而深入,成为当代探讨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里程碑式的事件。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傅永聚、韩钟文主编的《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系列丛书,此书共21卷,近1000万字,分21个孔子及儒学研究专题,实为对20世纪儒学研究实绩的综览和展示。其中“20世纪儒家文艺学研究”、“20世纪儒家美学研究”等分卷,收录了过去一百年间最具代表性的专论,其中更不乏对儒学与文学关系探讨的精辟之作,代表了现代及当代社会对两者关系研究的新高度。近年来,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学关系进行探讨的著作相继问世;^①但在学术成果繁兴的背后,考察魏晋文学与儒学整体关系的系统研究著作尚未见及,这无疑成了探讨儒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中缺失的一环。本书即希望为此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

第二,因为社会动乱、异域文化渗透等因素,魏晋儒学成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中衰阶段,但是它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的正统地位仍然存在,对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人心态及文学风潮都有重要影响。同时,儒学在与庄、老及佛教思想交流碰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玄化,体现出求同存异、涵容兼蓄的特征,这相对先秦原始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而言是较为不同的。因此,尽管探讨其他时段文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著甚多,但仍不能忽视或者取代对这一时期两者关系的研究。魏晋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体繁盛、文论成熟、才人佳作代出的重要阶段,儒学在促进文人人格塑造、释道圆融、文风构建、审美价值定型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文

① 如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饶龙隼《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卢盛江《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以上诸书均收入张岱年主编的“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中。此外,还有陈松青《先秦两汉儒学与文学》、冯良方《汉赋与经学》、王绍卫《孙吴文学与学术》(硕士论文)、陈炎、李春红《儒释道背景下的唐代诗歌》、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张文利《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高明峰《北宋经学与文学》(博士论文)、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文学研究》、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杨旭辉《清代经学与文学——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研究》等。在单篇论文方面则有刘师培《论各家文章与经子之关系》(《中古文学论集》)、张式铭《论孔子儒学及其对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的影响》(《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徐复观《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海外学人》第103期)、殷绍基《“经”学与文学》(《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科版)》1988年第1期)、汤贵仁《儒家思想的社会职能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刘再华《论经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张毅《儒学与儒家文艺美学的嬗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科版)》2004年第2期)、高明峰《论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5期)等,都共同呈现出这一领域的繁荣景象。

人与儒者两种身份融为一体的现象逐步明晰起来,他们的某些儒家著作同样体现了自身的意趣文风,颇具可读性;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或隐或显地传达了自我抱持的儒家理念,作品流传的同时也凭借自身的文名、位望,对儒学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应该说,儒学对文学有推动的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文学发展的阻力。儒家政治教化意味浓厚以及泥古不化的文人作品,往往因为丧失了文学应有的审美特性和抒情质素而失去生机与活力。为了摆脱儒学对文学的负面影响,魏晋反儒学思潮与反复古文风总是联袂同行,文学更表现出强劲的学科独立意识与反拨能力。因此,魏晋文学与儒学的关系是辩证的、交互的,对它们的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第三,南北朝、隋及初唐时期,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使文学环境逐渐由儒学化向文学化本来面貌过渡,尤其隋唐时期为纠正齐梁余风,促使盛唐气象的出现有着积极意义,其中实际包含了对魏晋及南北朝时期儒学与文学互动影响的得失加以批判性借鉴的因素。通过对魏晋文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不但可以较为清晰的揭示出此阶段文学与儒学关联影响的特点及规律,还可为探讨南北朝、隋唐以来儒学与文风建构的历史性课题提供必要的线索和启示。

二、研究范围及思路

本书旨在揭示魏晋文学在同期儒学思想影响下的发展情况,魏晋文学始终是主要视角,而魏晋儒学的嬗变发展则作为辅助视角。本书的讨论时限始于汉末桓灵之际,终于陶渊明生活的晋末宋初。从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李雄分别建国,此后相继共有十六个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直至439年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在这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南北之间除了战争之外,文化交流较少,北地儒学与文学在留守的士族文士及某些好文之主的推动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为北朝儒学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兹拟将这一部分放到下一个选题“南北朝儒文关系建构”的北朝部分加以论述,故在此不作过多涉及。本书除对魏晋各阶段文坛儒化色彩进行概述外,还选取众多具有经学著作或有深厚的经学修养的作家进行个案分析,并从魏晋诗歌、辞赋以及应用文体等方面探讨儒学文艺观的深刻影响。

刘师培曾说:“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辈出。其文约分为两派: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总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

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①若按照刘氏的思路,魏晋文坛除了道家文士、名法家文士之外,则尚可增加“儒者文士”这一类。本书选择论述的魏晋个体作家,正着眼其是否为“儒者文士”。所谓“儒者文士”,在有一定文学作品传世的大前提下,至少还应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有经学著作或儒家理论色彩鲜明的子书;第二,具有一定的儒学家学渊源,或以儒家价值信条作为立身处世的根底者。通过搜检魏晋史籍及清人、民国学者所辑补的经籍志、艺文志,魏晋儒家作家基本可分为四类:以文名称世而经学不彰者,如王粲(《尚书释问》)、刘桢(《毛诗义问》)、应贞(《周易论》)、陆机(《正训》)、束皙(《五经通论》)、曹毗(《论语释》)、卢谌(《杂祭法》)、李充(《论语注》、《尚书注》、《周易旨》)、袁宏(《论语注》)等;以经学名世而文名不彰者,如王肃(《宗庙颂》、《格虎赋》)、杜预(《七规》,一作《七矫》)等;经学与创作均有盛名者,如徐幹(《中论》)、葛洪(《抱朴子外篇》、《葛氏丧服变除》)、傅玄(《傅子》)等;虽染玄风而具有深湛的经学素养者,如曹植、何晏、应璩、阮籍、嵇康、傅咸、潘尼、挚虞、谢混、陶渊明等。若学界有关魏晋具有儒学素养的文士已多有论列,如曹植、张华、潘岳等,则在书中简化叙述;若论列较少,且兹能别出一种角度,则在书中列专节叙述。

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魏晋儒学的内容,一方面是此阶段列于学官的经书,包括《诗经》、《尚书》、《周易》、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等。^②另一方面,指魏晋儒学家们注经解经的著作,也包括他们阐发自身儒学思想的子家类著述。此外,清及近代学人辑补魏晋艺文志中一般列有“乐类”这一条目,像阮籍《乐论》、裴秀《乐论》、嵇康《生无哀乐论》等均予收入,然而正如丁辰《补晋书艺文志刊误》所说:“与《乐经》无涉,当

① 刘师培撰、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30页。

② 《晋书·荀崧传》载:“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郑氏、《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皆省不置。”荀崧认为:“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博士旧置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能半,宜及节省之制,以时施行。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宜为郑《易》置博士一人,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经过朝臣商议之后,司马睿下诏说:“《穀梁》肤浅,不足置博士,余如奏。”(参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976—1977、1977—1978页。)荀崧的谏言由于战乱并未真的施行,却也反映出儒家诸经及汉人注疏在魏晋官学中的地位。虽然《穀梁传》未列于学官,但因有范宁为之作集解,故亦列入讨论范围。

删。”^①《乐经》早佚,故本书将“乐类”中所收内容作一般的文学作品看待。朱熹曾指出:“《诗》中头项多,一项是音韵,一项是训诂名件,一项是文体。”^②可知朱氏将《诗经》分为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两个层面,认为它既是小学母体,又是文学范本。尤其“一项是文体”的论断,则是“六经皆文”思想的体现。本书对六艺经典大致秉持这种立场,主要对《春秋左传》、《穀梁传》、《诗经》、《周易》、《尚书》、《论语》、《礼记》以及魏晋儒家类子书的文学特性及对魏晋文坛的影响进行专门探讨。另外,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在当时列入杂史的范畴,兹拟在下一选题“南北朝儒文关系建构”中与南北朝的小说进行统一论述。

本书研究思路从三方面展开:第一,围绕“魏晋儒运兴替与士风建构”这一命题,从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入手,探究魏晋文学与儒学互动互融的条件,论证两者互联的基础与可能性,进而探讨魏晋儒文关系丰富而多样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按照汉末、三国、西晋、东晋的历时性脉络,考察魏晋王室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儒学思想环境的引导与营构作用,并着力探讨以三曹为代表的王室文学的儒学内涵及文风特色。此外,还立足魏晋地方官学及世族私学的发展情况,探讨其对魏晋儒学政治化、地域性、家学化的影响。最后,以东晋儒学文化型态与多元融通为主要视角,探析儒学玄化对魏晋士格、家风、学品的深刻影响。

第二,围绕“魏晋文士儒学思想特质及其文格建构”这一命题,同样遵循三国至东晋的时代线索,选取徐幹、王肃、阮籍、嵇康、杜预、陆机乃至陶渊明等21位具有儒化文风的作家进行个案分析。其分析思路主要包括:探究此类作家儒学素养的渊源及其生成历程,分析其儒学文艺观的内涵及表现,明确儒学政治思想及文艺倾向对其文风特征的建构作用,并尽可能揭示此类作家儒化文风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

第三,围绕“儒家文艺批评思想在魏晋文坛的应用和发展”这一命题,将儒家文艺批评思想归纳为儒家情性说、诗教观、《周易》文艺观(包括修养论、象论、情辞观)、山水自然观、政教文艺观(包括王道一统观、比德观、情理观、人伦教化观)等内容,并以魏晋诗歌、楚辞、散体大赋、颂、各种应用性文体(包括政治性、军事性、学术性、生活性等四种)为论域,分别进行专题化探讨,以体现儒学文艺批评思想对魏晋文坛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

^①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2月,页3700上。

^② 《朱子语类》卷八十“论读《诗》”,第2082页。

三、研究综述

基于儒学在魏晋时期式微而玄学大盛的事实,玄学本身及玄学与文学的关系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相关论著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均取得较高成就,充分表明这一视角的主流性和理论架构的成熟完善。魏晋玄学体现了儒释道的混会融通,它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也对此间儒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具有参照作用。另外,学界有关魏晋经学或儒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李申《中国儒教史》、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李中华《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两汉南北朝篇)》、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刘起釭《尚书学史(订补本)》、洪湛侯《诗经学史》、赵伯熊《春秋学史》、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徐芹庭《魏晋南北朝四十三家易学》、简博贤《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的产生》等等,也为本选题清理魏晋儒学思想背景、深化学理研究层次提供了丰富鉴镜。

涉足魏晋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论文成果,以日本、台湾学者为早。^①目前学界以魏晋儒学与文学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专著尚不多见,姚文铸《汉魏六朝文学与儒学》一书是较早之例,但偏重对汉代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其中收文章13篇,有11篇在谈两汉儒学与文学的关系;另外两篇一为《“玄”的渐进,人的觉醒——从阮籍谈起》,谈阮籍人格及诗歌受玄学的影响,一为《儒的复兴,文的渐进》,谈《文心雕龙》中的儒学内涵。此书论述多有独到之处,尤其后两篇对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台湾学者林登顺《魏晋南北朝儒学流变之省察》一书第四章第三节“儒学与人文的契合”中,以“文学理论思潮中呈现的儒学”为视角,分“文论上呈现的儒学”与“文学思潮下的其它形式呈现”两方面,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及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儒学意趣,其中魏晋时期文论则涉及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以及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葛洪《抱朴子·外篇》等重要内容,文学创作方面则又对诗歌、辞赋甚至小说与儒学的关系都进行全景式的概括。虽然这一部分篇幅不大,且带有提纲挈领的性质,却揭示了“魏

① 按,洪顺隆主编《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一书载有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汉魏六朝的学问と文学》一文,其发表于1938年《东洋文化大系·二》中;此外,还有台湾学者陈胜长《齐梁以前儒学思想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一文,发表于1972年《联合书院学报·十》。洪著为文津出版社,1987年9月版。

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潮中,大多透着儒学讯息,因此,实际的文学形式,也或多或少隐藏着儒学的精神”这一主题,^①对本文启发甚多。另外,闵虹、高小慧、王宏林《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文士文学》一书,以儒家德治思想为视角,考察其与文学的关系。书中第三章第一节为“魏晋南北朝德治思想及其文化品格”,主要论述曹操治国对儒家思想的借鉴以及《颜氏家训》与民间儒学教育两方面内容;同章第二节为“德治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士中的表现”,主要以“建安诗人”、诸葛亮《出师表》以及陶渊明为例,论述了他们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德治思想。应该说,这种发掘儒家某一重要思想范畴与文士文学关系的思路,对本文也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夏增民《儒学传播与汉晋南朝文化变迁》一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探究儒学传播对汉魏六朝的影响。尽管此书几乎没有涉及儒学传播对汉魏六朝文学有何影响的问题,但其关于魏晋儒学的传播方式、区域分布以及政治文化实效等方面的论述值得重视。

对某一儒家经典与魏晋文学关系研究的著作,以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两种为代表。前书分内外两篇,内篇旨在分析《周易》的语言艺术,揭示蕴寓其中的审美意识、文学观念、文学思维、情理品位等内容;外篇则在通论《周易》的人文精神、自然之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基础上,分析《周易》“感而遂通”的创作心理机制、“立象以尽意”的诗学转变、“神无方”的美学风采、“旨远辞文”的文学语言论以及接受鉴赏论、通变论,突出《周易》“刚柔有体”对作家气质、创作风格的作用。此书虽然仅外篇第五章第一节提及的“魏晋玄学与言意之辩”,与本文讨论的时段范围相吻合,但其对《周易》思想精义和文学内涵关系的构建,仍对本文具有指导意义。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一书第四章为“魏晋六朝《诗经》文学阐释的空前活跃”,并分“魏晋六朝的思想学术与《诗经》研究”、“《诗经》的经学结构与文学定位”、“魏晋风流与谢氏家族的品《诗》”、“刘勰对《诗经》艺术的系统评论”、“锺嵘、萧纲:《国风》范型地位的凸现”、“魏晋六朝中的《诗经》阐释”等六节,应该说比较清晰的勾勒出了魏晋六朝《诗经》传播与接受的面貌。

近年来就魏晋文学与儒学关系为选题发表的论文,较有代表性的为谭德兴《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互动》(《北方论坛》2004年第2期)、黄黎星《魏晋南北朝文论与经学关系之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

^① 林登顺著《魏晋南北朝儒学流变之省察》,天津出版社,1996年4月,第371页。